

故乡山药蛋往事



家在太原

钟楼街记忆

晓根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住在新建路28号大院，人们叫它省直农口大院，住了有七八年时间。单位省气象局就在新建路羊市街口对面，离宿舍近，去钟楼街很是方便。穿过羊市街一路向东，过了宽银幕，再过解放路十字路口，钟楼街就到了。

钟楼街是太原市历史悠久的繁华街市，商场毗连，店铺林立，小到针头线脑，大到家具家电，无论是剃头制衣，还是喝酒吃饭，应有尽有。

我曾在按司街上剃过头，在华泰厚店里做过衣服。吃元宵去老鼠窟，买闹钟上亨得利。在开化市买过自行车，在大市中买过圆桌、电镀折叠椅。拍照过去街东头的开明照相馆，买邮票、寄信去过西头的邮电局，小饭店里吃过炸酱面，上海饭店的包子馋得人口水流……

记得邮局旁有个小饭店，忘了叫什么名字，以面食为主，有一毛五一碗的炸酱面、一毛八一碗的浇肉面，还有八分钱一碗的白皮面。

那时工资低，一个月只有36块钱，轻易不敢下馆子。有时实在嘴馋，就去吃上一碗炸酱面。吃面是为了喝啤酒。那个年代物质匮乏，市场上很难买到啤酒，只有到了饭店才有啤酒卖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只有买人家的饭或菜，才卖给你一碗啤酒。

我往往是花上一毛五分钱二两粮票，要碗炸酱面，再加上两毛钱要碗生啤。啤酒装在大木桶里，服务员把木桶上的龙头打开，那凉津津、起着白沫、冒着气泡的啤酒就流出来了，没等服务员把酒端上桌，口水已在嘴里打转。先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面，再喝上一口凉津津的酒，顿时暑气全消，那个舒坦，至今想起来都美滋滋的。

除了小饭店，上海饭店咱也吃过，不过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，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敢去的。那里的饭虽好，可也贵。

第一次是参加工作不久，带父亲去柳北一个口腔门诊部镶牙，镶完牙后，也到饭点了，于是我领父亲来到位于钟楼街的上海饭店。父亲说，太贵了，找个小吃铺吃碗面算了。我说，咱也不天天来吃，尝尝鲜嘛。父亲拗不过我，只好跟我进了饭店。

上海饭店当时是与晋阳饭店、林香斋齐名的“太原三大饭店”之一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是个高大上的地方，能在里面吃顿饭，是很有面子的事。虽然我只有36块钱的月工资，但请父亲在上海饭店吃饭是我早就想好了的，一直没机会，这次也算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一种回报吧。

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家餐馆，上二楼，进了个小包房。点的什么菜已记不清，只记得给父亲打了二两散装白酒，还有小笼包。那包子真叫个好吃，皮薄馅大，卤汁饱满，鲜美可口。虽没点什么有名头的菜肴，可我看得出，父亲吃得很高兴。

第二次是在和妻子结婚登记后去的。结婚成家乃人生大事，理当庆祝一番，我和妻子从庙前街办婚姻登记处领完证出来，就直奔上海饭店而去……

后来我还和同事去过一次。没点菜，只点了包子，我们就是冲着上海饭店的小笼包去的。

虽然只是有数的几次，上海饭店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每每想起，那白胖胖的小笼包子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，真是呼之即出，挥之不去……

故乡婺源大量种植山药蛋，这里的山药蛋沙面好吃，这个晋西北高原的特产，总是让我魂牵梦绕。

小时候秋天到来时，上学的我们也恰好放假，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帮着收山药蛋。那景象何等壮观啊！山丘像金纱漫过，流动着的“金纱”上，到处是抢收的人们。山药茎叶已经枯萎，枯萎的根部出现隆起和裂口，顺着裂口，掀开泥土，一定会摸到山药蛋。男人们用镢头在前边刨，女人们挽着篮子跟在后边捡，把一颗颗白的、黄的、紫红的山药蛋从土里掏出来，放进篮里，再倒在一起，堆起一座小山包。

后来，弟弟出生那年，由于遭灾，山药蛋少了，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，每天只能以野菜伴些小米充饥。母亲奶汁少了，弟弟饿得嗷嗷大哭。看着这般情景，我流着泪问母亲：“娘，你说为啥山药蛋少了呢？”母亲摸着我的头，哽咽着说：“孩子，好好念书吧！”看着母亲红肿的眼睛，看着弟弟消瘦的小脸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一天放学后，我把书放在教室里，提着空书包跑上了山峁。在一片刚收完的山药蛋地里，使劲用两只小手不停地挖着每个空坑，希望能有一颗硕大的山药蛋滚出。我挖呀挖呀，忽然，发现一个小坑里，有一根毛发般细小的根茎，向远处的泥土延伸。顺着这根希望的“小金丝”，我慢慢地挖着，手指突然碰到一个硬块，我小心地把上面的泥土剥去：啊，一颗白白的、嫩嫩的、如拳头大小的

山药蛋暴露在我的面前。我没有立刻把它放进书包里，而是细细地端详着，看它上面的每一个隆起和每一处凹陷，以及它的形状和在泥土中的位置……

我没有停，一直挖了满满一书包山药蛋，提回家。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抱住我渗出血的手，“哇”地一声放在自己口里。母亲做了一顿山药蛋饭，我看着弟第一口一口香甜地吞咽着棉花似的山药肉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！

农村实行大集体时，庄稼由生产队统一种植，打下的粮食再分到各家各户，每年粮食都不够吃，要再挖点野菜补充。每到夏秋季节，粮食所剩无几，只有少许几篮发了芽的山药蛋。母亲每天劳动回来，总要挖回一篮野菜，把野菜洗净切碎放入锅里，再加几块山药蛋，便是中午饭了。那野菜叫“杨菊菊”，吃在嘴里，苦涩难忍，嚼半天才能下咽。每次吃饭，第一碗有山药蛋的盛给父亲，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，必须吃饱。接下来是孩子们的，山药蛋少了点。轮到母亲时，锅里只有野菜了，但母亲一声不吭，默默坐在厨房的地上，慢慢嚼着苦苦的野菜，不时还要夹几筷子扔给地上觅食的小鸡。

后来，老百姓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，山药蛋不仅能够满足自家吃，还能卖到外面。我参加工作后，住在城里，每年厨房里总要备几袋山药蛋。即便到饭店吃饭，也首先要点一道山药蛋的菜。每天不吃山药蛋，就觉得肚里没饱似的。

父母已年逾古稀，年轻时受过太多的

苦。休息以后，儿孙们总想让他们过得好一些，常常到超市买些好吃的，也从外地让人稍回稀罕水果、高档点心。可他们却放着不吃，或者给了邻居的小孩，每天仍然要吃山药蛋。遇此情况，儿孙们总要规劝。母亲说：“山药蛋好吃、养人，已经习惯了，总也吃不腻的。”大家不服气，还在争辩，还在劝说，但我同意母亲的说法。

说到山药蛋的吃法，那真是数不清。油焖土豆、土豆炖排骨、土豆烧牛肉、油炸土豆泥等等，都非常好吃。但深埋在记忆中的还是儿时的吃法较多。常常在双休日下厨，变着花样儿做着吃。比如“炖烩菜”就常做。将山药蛋切成块，辅之以粉条、豆腐、金针、海带，炖在一起，起锅前将小炒肉在上面一浇，香喷喷，热腾腾，着实好吃。还有“磨擦擦”，将山药蛋皮削净后，放在打有小铁碴的铁皮上，来回转圈磨，然后在磨下的碎末里加入面粉，再捏成一些小块，放在蒸笼里蒸。蒸熟后，揭开锅盖一看：嚯，满笼里像放着一件件精致的工艺品，闪着青光，散着清香，把它们放在碗里，加些盐醋等调味品，递进口里一嚼，绵软细滑，简直是天一道好菜。

山药蛋是山里人的主食，又是城里人的配餐。走在城里的街上，发现开了不少的粗粮馆、土豆馆，那些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，也纷纷前来品尝。市场里贩卖山药蛋的商家也不少，既赚了钱，又帮农民找到了销路。据说，山药蛋有降脂、美容的作用，是养生的上好绿色食品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symtywb@126.com 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

儿时玩泥巴

晓阳

人们形容和谁的关系铁，常常会说：我们是小时候一起玩“尿泥”长大的。这对于现在玩手机长大的孩子来说，恐怕很难理解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居民们为了烧火做饭取暖，常到太原东山脚下拉“烧土”，用这种土和煤面掺和起来和煤泥拍煤饼。这些烧土中有一种颜色发紫、粘性十足的土，是孩子们玩泥巴的最佳材料。用这种土和出来的泥，我们叫它“胶泥”。

和泥时，我们先把土中的小石粒拣出来，再把土坷垃捣碎，如有条件最好能用筛子筛一遍，使之成为细土，然后兑上适量的水，像和面那样反复揉搓，这样和出来的泥柔软而有韧性。

泥和好了，我们就按照各自的喜好捏制各种物件。如能发出稚嫩而尖锐声响的泥哨，外形逼真、炮塔履带俱全的微型坦克，有鼻子有眼四肢俱全的泥人等等。当然，捏一支“二把盒子枪”，是买不起玩具枪的男孩子们的最爱。“玩打仗”时手里掂一支“盒子枪”，那感觉真叫一个酷。

除了捏制各种心仪的物件外，我们还爱玩一种叫“补锅”的游戏，就是三两个小伙伴各自和好一块大于“半头砖”的泥坨，把它捏成“平底锅”形状，找一块平地，以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确定先后次序，将手中的“锅”底朝上、口朝下，以恰到好处的力量平行扣向地面，使“锅底”由于空气作用爆开一个窟窿，另一个小伙伴就要视窟窿的大小，拿出自己的泥巴把这个窟窿补上。谁的“锅”爆的窟窿大，谁就赢的泥巴多，但如果你摔“锅”的时候把“锅边”也摔裂了，就算输了。所以“做锅”的工艺就很讲究，和泥要和到位且软硬适度，锅的周边要薄厚均匀，锅底稍薄于锅边而不漏气。摔的时候也有讲究，手腕翻扣要迅速，用的力度要适中，特别是要让“锅口”水平着地，才能使锅里面的空气冲破锅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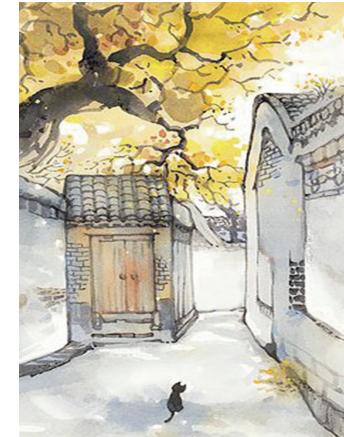
玩泥巴的过程中，有时需要加湿和泥而附近又没有水源，有的孩子就撒泡尿来和泥，“玩尿泥”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吧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无论是用泥巴捏制自己喜爱的玩具，还是“补锅”的游戏，都培养了小孩子“动手”的能力和争强好胜的心性。

此刻，望着书桌上母亲的遗像，我又想起敬爱的母亲了。

1985年6月11日，我正在山纺中学高文科班给学生们上语文课，突然接到妹妹从天津发来的加急电报：“母病危，速归。”我请了假连夜乘火车赶回天津，径直来到医院病房，妹妹悄悄告诉我：“母亲弥留许久，好像就是等你了。”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头，对着她的耳朵说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我似乎看到母亲在点头，抑制不住感情大声哭了起来。当晚我守候在母亲身旁，握着她瘦削的手，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出生在贫苦人家，从未上过学，但凭着聪明好学，学得一手好针线，做得一手好饭菜。嫁给父亲后，一生操劳，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。哥哥在天津汇文中学上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，天津一解放，他就参加解放军南下了，深明大义的母亲为哥哥收拾好行装，含泪送走了哥哥。我家成了军属，街道每月发给生活补贴，母亲又揽下糊火柴盒的营生，虽说生活十分拮据，但仍供我们上学。1952年，我考上天津百年老校铃铛阁中学，小学四个班只考上我一个，录取名单还登在《天津日报》上。母亲喜极而泣，奔走相告，还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烙饼炒鸡蛋。上初



深深的怀念

李汝骥

中了，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件蓝布中山服，我一直穿到高中毕业，六年间缝缝补补，几次加长，坐在我座位后的同学笑着对我说：“看见你衣服上密密麻麻的针线眼儿，我直眼晕。”

1973年，我得了肺结核，从太原回到天津父母家养病。父亲说：“对这种慢性病要三分治，七分养。”母亲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对疾病，治疗不可少，健康饮食不可少，身体锻炼不可少，快乐心情更不能少。”在父母精心调养下，我的病很快治好，告别双亲时，看到父母双鬓白发，我落泪了。返回太原后，我重新登上高中语文课讲台，牢记着母亲的教导：“你要好好教书！”

1985年6月13日，我回到天津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，我们兄弟姐妹悲痛至极，料理完丧事，我怀着无限思念母亲的心情回到太原。从此我的书桌上多了一张母亲的遗像，每当抬头看到母亲慈爱的面容时，我就增加了努力学习的动力。第二年我教的文科班语文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，学校发给了我一笔不菲的奖金，我寄给了妹妹，我们共同置办了一块墓地，让父母合葬，我也曾回天津祭奠扫墓。

如今母亲离开我们36年了，但那些往事时刻温暖着我们的心灵，激励着我们向真诚、善良、勤俭、高尚的境界迈进。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